

一九四六年

观察

第二卷 第一十二期

觀 察

· 版出六期星逢 ·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冊上卷二第



冊上卷二第

本冊撰稿人

梁漱溟 傅斯年 錢端升 簡貫三
莊智煥 季羨林 錢鍾書 儲安平
吳世昌 蕭公權 戴文賽 雷海宗
李慕白 楊人梗 鄭林莊 吳元黎
陳衡哲 李純青 浦熙修 蔡壬侯
劉迺誠 宜移今 張嘯虎 張東蓀
楊 剛 史立常 伍啓元 張 銳
虞 愚 蔡維藩 潘光旦 全慰天
李廣田 王芸生 費孝通 周綬章
魏登臨 楊 絳 任鴻雋 李浩培
傅統先 張述祖

撰稿人

蕭公權 戴文賽 錢鍾書 錢端升 劉光旦 趙家驊 葉公超 楊人梗 傅斯年 傅希孟 郭有守 管東蓀 張沈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陳瘦竹 許德珩 高堂敷 孫克寬 柳無忌 胡適之 宗白華 沙學浚 李鴻猷 吳澤霖 呂世昌 伍啓元 王之琳 王芸生 王羲之 任鴻雋 沈恩裕 李廣田 李純青 周綬章 季羨林 徐先驥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瘦竹 曹健哲 張印堂 張忠絃 黃正銘 章友蘭 馮昭倫 費孝通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錢端升 錢端升 鮑端光 顧世光 顧頡 翦乾

撰稿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見觀察

·元百五千一售·

日一月三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達

再版

期一第



卷二第

專論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教師與進步

經濟緊急狀態評論專文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

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觀察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長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通信

西康的民變·夷變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欄欄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文藝

說「回家」

錢鍾書

觀察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傅孟真

文摘

讀者投書(五封)

編輯後記

撰稿人

蕭公權	戴文鏡	錢歌川	錢能欣	劉光杰	潘家旦	葉超	楊人	楊人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	管東	張沉	梁實秋	夏炎	陳瘦竹	陳友松	許德珩	高克敏	孫克	柳無忌	胡適	宗白華	沙學浚	李培	吳澤霖	呂昌復	伍啟元	王中琳	卞之琳
顧翊羣	戴世光	鮑端民	錢清	錢廉	樓維藩	蔡超	趙海	楊宗	費孝通	曾昭	馮蘭	章正	黃正	張忠	張印	曹錕	陳維	陳毅	許衡	馬君	徐寅	胡先	季義	周子	李廣	李廣	吳恩	沈裕	任有	王鴻	王慈

撰稿人

讀者投書

致讀者 編者

從第二卷一期起，我們騰出這頁來刊載讀者投書。但讀者投書時，希望是一封「信」，而不是一篇「文章」；不要長篇大論，最好二三百字，甚至寥寥數行亦可。紙價太貴，我們希望盡量經濟篇幅，俾能多登幾封讀者來信。

新疆綏遠的省名

編者足下：查新疆之名，定於遜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時論方平，西陲粗定，設為行省，以便敷化。殊不知「新」之含義，頗多語病，細味其意，一若其地方自隣封以武力擴張據為己有者然。此殆數典忘祖，置漢代經營西域之史實於不顧，愧負豐功偉績彪炳史冊之民族英雄（班超）（張騫）二公多多矣。讀左宗棠上清庭奏摺，其論該省，曾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幽燕，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省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將無安眠之日……」等語，謀遠慮遠，自是論。謹按卅三年夏，美前副總統華萊士乘船來華，下機迪化，曾發書而談話，中有「……顧名思義，新疆之命名，是你們（意指國人）給它定

的」等語，措辭含蓄，寄託深長，百外之意，頗堪玩味。前此威爾基先生於「天下」一書中，對於該省亦專章敘述，指陳現狀，月旦人物，語均驚人。並承認漢代政治勢力遠達西域之史實。（按：漢代史地家不稱「新疆」而命名西域，自極精當。）「新」者，舊之對，既名其地曰新疆，則相對之義，毋乃自承其地非吾素有乎？此其不妥。實莫大焉！竊以為不如逕行改名為西疆，似為較符名實。（或問：該省天山南路舊稱南疆，北路稱北疆，今若改稱西疆，得毋有混淆嫌？關於此點，鄙意以為可改稱南疆或北疆，亦猶浙東、皖南、湘西、蘇北之成例，以地名為主，以區位為從也。至新疆原名，其後一律廢止不用。綏遠省名，竊亦認為不妥，（徒以其地昔曾派駐「綏遠將軍」，故名，別無其他意義）蓋當此原于能之時代，南北二極，均為列強欲得而甘心之目標，胡澆澆乎將至與星球交通之遠景，今該省地處國境之內，為內陸省區，倘仍以綏遠處之，以視視之，何其局限一隅，將何以仰副國父建國之遠大規模？似亦亟須另易其他名稱。

王執中 廿五、十二、十、郵縣

新疆譯名正誤

編者足下：最近在中華時報及申報內，見有譯自外記者筆陀、屈萊克「新疆透視」之譯文，內容多有誤解及譯名可商榷。國八素以外記者之報導為「了不起」之發見，實則置對於我國形勢，未必深切認識，同時亦足見國人對新疆之隔閡及前往該地人士之莫由深入。筆者所見，僅係數點

，未窺全貌，僅先就其大者，加以校改。中華時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事實上該省大部份的商產均出產於西北的富庶區（伊犁、泰巴格泰及阿爾泰）」。按泰巴格泰即係塔城，蒙名我素譯為塔爾巴哈台，今譯泰巴格泰，令人莫解。又阿爾泰物產不豐，除產金外，其他地方出產之麥（不產稻），在豐年時僅足自給，伊塔二區尚可稱富庶，阿山則不然。同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迪化亦無法與哥薩克斯坦競爭」，按此原文所指乃係哈薩克斯坦，位接新疆，絕非歐陸之哥薩克。過去國人時誤以哈薩克為哥薩克，應注意分辨。同報十一月十七日刊「扶蘇油田」，應改為烏蘇油田，此油田在烏蘇縣南之獨山子。同報十一月十四日刊「叛軍約三萬左右，由回紇族，固爾扎族……」按伊犁準語為固爾扎，係地名，非族名，譯為固爾扎人或伊犁人則可，譯為固爾扎族則不可。申報十一月十九日刊「……烏伊格人，寇爾吉茲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佔滿整」，烏伊格人現通譯為維吾爾。寇爾吉茲人新疆通譯為柯爾克斯，一般書內譯為基爾吉斯。我國譯非國語之地名，人名，素多紛歧，令人生惑，但於一般通用者現已趨一致，譯者應當注意。又蒲犁陷於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並非二十六日，現在國軍尚未將此地收復。謹註於此。周東郊三十五年十二月 蘭州

互助會

編者足下：近讀尊作「辛勤忍耐向前」一文，頗受感動。我現在腦中藏有一個意見，即中國好人向無組織

。我想凡是中國好人，應組織一個互助會，自設範疇，自設繩墨，所有會員，當誓共守。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轉變風氣。先生其有意乎？ 蔣錫昌 二月十五 無錫

蔣先生這個意思很好。但這祇是一個原則，可否再擬一點具體辦法出來？（編者）

抗幣與法幣的匯率

編者先生：你知不知道原來在抗幣與法幣之間也是有匯率的。二月十八日字林西報所刊延安廣播，謂去年十二月抗幣與法幣的匯率是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三角，今年一月改為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五角，最近金潮以後，延安二月十七日廣播，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八角。我們一天到晚被「外匯外匯」弄得頭昏腦脹，原來除美匯英匯港匯外，還有一個「延匯」。真是越弄越糊塗了。

衛生 二月十八日 上海

中國人的命運

編者先生：軍調部解散，中共雙方人物，紛紛發表談話，蔡文治還在私邸宴請葉劍英。據說他們都「私交很好」。我又想起蔣主席和毛先生在重慶舉杯相敬的那張照片。這幾個月來人確死了不少了，到底為了什麼？你看吧，也許將來有一天那些巨頭又要握手言歡，舉杯互慶哩！有槍的，還殺人，無槍的永遠被殺。這是中國人的命運。

文秀村 二月十八日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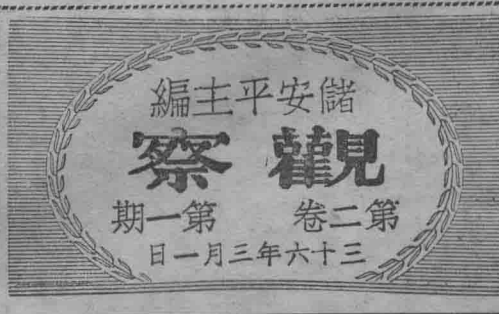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梁漱溟：

傅斯年（孟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莊贊煥：全國工業協會理事

季羨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錢鍾書：前西南聯大教授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我現在提出兩句話，貢獻給國人，特別是貢獻給國內各方面有心人士：

- 一、樹立自己信用；
- 二、力求彼此合作。

以下我說明所以提出這兩句話的大概意思。

一

我認為中國今天正是舊社會崩潰解體，新社會建造未成之際。一切問題，一切病痛，罔不由此而來。而卅餘年間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則尤表著其苦悶之焦點。所謂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亦即指國家大局之總不得統一穩定而言。此一焦點，即全部問題之反映；而由此處不解決，其他問題其他病痛乃益相緣而無法解決。如此輾轉增上，牽纏一堆。——這是我的診斷，自民國十七八年到今天，沒有改變過。我從來不同意那一切歸咎帝國主義的流行說法。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問題主要是在中國社會本身，尤其在社會之崩潰解體。我從來亦不同意那「貧、愚、弱、私」一類說法（胡適之先生曾有五大魔之說亦此一類）。中國人的缺點，誰不看見；但問題之在社會組織結構間者，遠較其在各箇份子身上者嚴重多多。此外，從「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則封建勢力之殘存，亦被認為問題所在。我承認有些舊東西舊勢力尙待肅清；然除之之法則在培養新東西新勢力。若無新者之起來替代它，它不會去掉底。所以這些總非主要問題所在。

今天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國際地位已大爲改善，而中國問題初未因以鬆解。反之，中國人的災難今竟陷於無比之嚴重地步。這完全證明了我說問題主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而底話。

我的認識既然如此，我的主張就一向集中在如何引此崩潰底舊社會，渡到新社會之建設途程上；而對於任何題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題目底對內作戰，均不承認，反對到底。十多年來，我不滿意國民黨，不滿意共產黨，就爲此。在新社會建設途程上，開頭一步必在國家權力粗得統一。這原是建設的必要前提。至於真正統一之確立，必待建設乃得完成。這亦即是說：先求政治問題一初步解決；至於政治問題之完滿解決，那要隨着新社會建設之完成而完成底。這國家權力之粗得統一，當抗戰初起，我以爲大有希望。我同意毛澤東先生的見地：長期抗戰決定長期合作；抗戰中的合作決定抗戰後的合作。即我料想強敵壓境，必可促成國內團結，而使國家漸達於統一。我的堅強論據，就在中國人不團結不能驅除敵人，此無可置疑者；而我們之必定驅除敵人，亦屬堅信不疑之事；則在勝利之前

讀者投書

致讀者 編者

從第二卷一期起，我們騰出這一頁來刊載讀者投書。但讀者投書時，希望是一封「信」，而不是一篇「文章」；不要長篇大論，最好二三百字，甚至寥寥數行亦可。紙價太貴，我們希望盡量經濟篇幅，俾能多登幾封讀者來信。

新疆綏遠的省名

編者足下：查新疆之名，定於遜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時論方平，西陲粗定，設為行省，以便敷化。殊不知「新」之含義，頗多詭病，細味其意，一若其地方自隣封以武力據據為已有者然。此殆數典忘祖，置漢代經營西域之史實於不顧，愧負豐功偉績彪炳史冊之民族英雄（班超）（張騫）二公多多矣。讀左宗棠上清廷奏摺，其論該省，曾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幽燕，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省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將無安眠之日……」等語，謀深慮遠，真是的論。謹按卅三年夏，美前副總統華萊士乘船來華，下機迫化，曾發書面談話，中有「……顧名思義，新疆之命名，是你們（意指國人）給它定

的」等語，措辭含蓄，寄託深長，自外之意，頗堪玩味。前此咸爾基先生於「天下一家」書中，對於該省亦專章敘述，指陳現狀，月且人物，語均驚人。並承認漢代政治勢力遠達西域之史實。（按：漢代史地家不稱「新疆」而命名西域，自極精當，）「新」者，舊之對，既名其地曰新疆，則相對之義，毋乃自承其地非吾素有乎？此其不妥。實莫大焉！竊以為不如逕行改名為西疆，似為較符名實。（或問：該省天山南路舊稱南疆，北路稱北疆，今若改稱西疆，得毋有混淆嫌？關於此點，鄙意以為可改稱西南或東北，亦猶浙東、皖南、湘西、蘇北之成例，以地名為主，以區位為從也。至新疆原名，其後一律廢止不用。綏遠省名，竊亦認為不妥，（徒以其地昔曾派駐「綏遠將軍」，故名，別無其他意義）蓋當此原子能之時代，南北二極，均為列強欲得而甘心之目標，朔澗漢平將至與星球交通之遠景，今該省地處國境之內，為內陸省區，倘仍以綏遠之為號視之，何其局限一隅，將何以仰副國父建國之遠大規模？似亦亟須另易其他名稱。

王執中 卅五、十二、十、郵縣

新疆譯名正誤

編者足下：最近在中華時報及申報內，見有譯自外記者華陀，風萊克「新疆透視」之譯文，內容多有誤解及譯名可商榷。國八素以外記者之報導為「了不起」之發見，實則或置對於我國形勢，未必深切認識，同時亦足見國人對新疆之隔閡及前往該地人士之莫由深入。筆者所見，僅係數點

，未窺全文，僅先就其大者，加以校改。中華時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事實上該省大部份的商產均出產於西北的富庶區（伊犁，泰巴格泰及阿爾泰）」。按泰巴格泰即係塔城，蒙名我素譯為塔爾巴哈台，今譯泰巴格泰，令人莫解。又阿爾泰物產不豐，除產金外，其他地方出產之麥（不產稻），在豐年時僅足自給，伊犁二區尚可稱富庶，阿山則不然。同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進化亦無法與哥薩克斯坦相競爭」，按此原文所指乃係哈薩克斯坦，位接新疆，絕非歐陸之哥薩克斯坦。過去國人時誤以哈薩克為哥薩克，應注意分辨。同報十一月十七日刊「扶蘇油田」，應改為烏蘇油田，此油田在烏蘇縣南之獨山子。同報十一月十四日刊「叛軍約三萬左右，由回紇族，固爾扎族……」按伊犁準語為固爾扎，係地名，非族名，譯為固爾扎人或伊犁人則可，譯為固爾扎族則不可。申報十一月十九日刊「……烏伊格人，寇爾吉茲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佔滿整」，烏伊格人現通譯為維吾爾。寇爾吉茲人新疆通譯為柯爾克斯，一般書內譯為基爾吉斯。我國譯非國語之地名，人名，素多紛歧，令人生惑，但於一般通用者現已趨一致，譯者應當注意。又滿整陷於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並非二十六日，現在國軍尚未將此地收復。謹誌於此。周東郊三十五年十二月 蘭州

互助會

編者足下：近讀尊作「辛勤忍耐向前」一文，頗受感動。我現在腦中藏有一個意見，即中國好人向無組織

。我想凡是中國好人，應組織一個互助會，自設範疇，自設繩墨，所有會員，當誓共守。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轉變風氣。先生其有意乎？ 蔣錫昌 二月十五 無錫 蔣先生這個意思很好。但這祇是一個原則，可否再擬一點具體辦法出來？（編者）

抗幣與法幣的匯率

編者先生：你知不知道原來在抗幣與法幣之間也是有匯率的。二月十八日字林西報所刊延安廣播，謂去年十二月抗幣與法幣的匯率是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三角，今年一月改為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五角，最近金潮以後，延安二月十七日廣播，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八角。我們一天到晚被「外匯外匯」弄得頭昏腦漲，原來除美國英匯港匯外，還有一個「延匯」。真是越弄越糊塗了。

衛生 二月十八日 上海

中國人的命運

編者先生：軍調部解散，中共雙方人物，紛紛宴會話別，蔡文治還在私邸宴請英劍英。據說他們都「私交很好」。我又想起蔣主席和毛先生在重慶舉杯相碰的那張照片。這幾個月來人確死了不少了，到底為了什麼？你看吧，也許將來有一天那些巨頭又要握手言歡，舉杯互慶哩！有槍的，還殺人，無槍的永遠被殺。這是中國人的命運。

文秀村 二月十八日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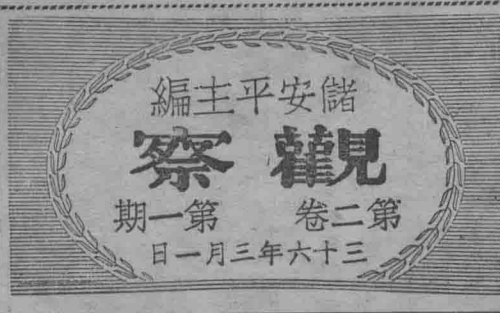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梁漱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莊智煥：全國工業協會理事

李漢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錢鍾書：前西南聯大教授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我現在提出兩句話，貢獻給國人，特別是貢獻給國內各方面有心人士：

- 一、樹立自己信用；
- 二、力求彼此合作。

以下我說明所以提出這兩句話的大概意思。

一

我認為中國今天正是舊社會崩潰解體，新社會建造未成之際。一切問題，一切病痛，罔不由此而來。而卅餘年間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則尤表著其苦悶之焦點。所謂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亦即指國家大局之總不得統一穩定而言。此一焦點，即全部問題之反映；而由此處不解決，其他問題其他病痛乃益相緣而無法解決。如此輾轉增上，牽纏一堆。——這是我的診斷，自民國十七八年到今天，沒有改變過。我從來不同意那一切歸咎帝國主義的流行說法。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問題主要是在中國社會本身，尤其在社會之崩潰解體。我從來亦不同意那「貧、愚、弱、私」一類說法（胡適之先生曾有五大魔之說亦此一類）。中國人的缺點，誰不看見；但問題之在社會組織結構間者，遠較其在各份子身上者嚴重多多。此外，從「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則封建勢力之殘存，亦被認爲問題所在。我承認有些舊東西舊勢力尙待肅清；然除之之法則在培養新東西新勢力。若無新者之起來替代它，它不會去掉底。所以這些總非主要問題所在。

今天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國際地位已大爲改善，而中國問題初未因以鬆解。反之，中國人的災難今竟陷於無比之嚴重地步。這完全證明了我說問題主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底話。

我的認識既然如此，我的主張就一向集中在如何引此崩潰底舊社會，渡到新社會之建設途程上；而對於任何題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題目底對內作戰，均不承認，反對到底。十多年來，我不滿意國民黨，不滿意共產黨，就爲此。在新社會建設途程上，開頭一步必在國家權力粗得統一。這原是建設的必要前提。至於真正統一之確立，必待建設乃得完成。這亦即是說：先求政治問題一初步解決；至於政治問題之完滿解決，那要隨着新社會建設之完成而完成底。這國家權力之粗得統一，當抗戰初起，我以爲大有希望。我同意毛澤東先生的見地：長期抗戰決定長期合作；抗戰中的合作決定抗戰後的合作。即我料想強敵壓境，必可促成國內團結，而使國家漸達於統一。我的堅強論據，就在中國人不團結不能驅除敵人，此無可置疑者；而我們之必定驅除敵人，亦屬堅信不疑之事；則在勝利之前

統一，不是確定了嗎？勝利前統一，勝利後還能分裂嗎？那曉得事實竟不然！勝利前就沒統一。勝利後之政治協商會的任務，是專為謀國家統一底，看看可以成功；而偏偏到今天還是失敗！凡此均可見其迎合之機遠不逮崩離之勢；中國社會之大可憂者在此。

二

中國今日所苦，就在舊社會崩潰，新社會未成，前後左右不接氣；我們除一面仍要努力和乎統一運動，固不待言，一面便應當從根本上作接氣工夫。此接氣工夫有二。

其一，便是致力文化問題的研究，而謀不同文化之溝通。因為使得中國舊社會崩潰底，並使得它新社會不易構成底，全是在文化之雜亂不調上。非從這裏謀得其溝通協調之道，便無法使眼前那些頭腦不同觀念不同底人彼此接氣。又非從這裏研究，便無法看清楚前途要建設怎樣的新社會，及如何建設之途徑，而使前後社會早得接氣。最近我在大公報上「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曾略申其意，請參看。其實民國廿三年春，天津大公報初闢星期論文欄，我寫「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時候」一文，我早就點出下面一些話給國人：

從中國固有思想與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衝突，又西洋近代思想與其最近思潮之矛盾衝突，使得今之中國人迷亂紛歧，無法可構成一種優勢底理性勢力，亦就無法產生一優越有力底意思要求，以壓倒其他，而為製定憲法之本。

中國人真成了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癢都到不了一處，意見理解很難相通。其形勢之分散，心理之乖舛，蓋古今所不可一轍。丁文江先生嘆息中國人沒有公共信仰。其實何敢談信仰，且問他，有沒有共同的問題公共的要求！

那時丁文江先生適有一文在大公報上，說要建立公共信仰底話。其意似與近中觀察週刊吳世昌先生「中國需要重建權威」之說相近。吳先生在他文內，有這樣話：

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樞思想上底大柱子，頂住了這社會的組織機構。（見觀察

（一卷八期）

此其用意，似與我有相近處；足見問題所在，大家亦都感覺到。但我却不說「建立信仰」，「建立權威」，其他亦有不同，後當再論，此不多及。又其一，便是現在所提出底兩句話了。這兩句話，要分別講一講。

馬歇爾會說，為中國國內和局最大障礙者，即國共兩方彼此猜防太過，彼此不放心。這是事實。其實今天何止國共兩方彼此相信不及。在此廣大社會中，遍處皆是彼此不信任底空氣。政治上，由此而黨派合作不成，固然釀出當前莫大災難；其實這種含毒氣之流行，在社會之組成上便是根本底大危機。它可以使社會不成社會，失去社會所以存在之道。但我們怪誰呢？本來遍處都是騙子呀！遍處是騙局，遍處是謊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尤以政治上為最甚，尤以政府當局為最甚。居高臨下，製造而播這種毒氣的，正是那些在上底人物！單是「壞事作盡」都不打緊，最可惡却是同時他「好話說盡」，使信義幾若非人間所有，根本破壞社會所以組成之道。

為大局求轉機，近而各方面能和平合作，遠而圖新社會建設之有成，所以我以這「樹立自己信用第一」一句話貢獻於國人，並懷着萬分懇切心情祈求於國人。社會上增多一箇有信用底人，即增多一分元氣。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進行即因之多一分積極可能。對於今天的中國，這就是極可貴之貢獻。假若是一箇黨派或一箇團體，或一箇負時望底人物，或一箇在社會有相當地位底人，那所關係者就更大。我們特別懇求他千萬自愛，一言一動，出處進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萬不要不自愛惜，以致人們對他失望。那將不僅是他箇人之自毀，而實在給予此可憐之社會又一大打擊，一大破壞。他將不僅對不起他自己，他實更負罪於國家社會。我說這話，我直欲跪在他面前向他垂涕而道了。我大聲高唱一句：樹立自己信用第一！

本來人類社會所賴以組成者，如宗教、禮俗、法律、制度、一切成文或不成文底東西，大體都出於人為底，都是後天底，亦即是文化底，然人類所有好誠實惡詐欺之一點，則是先天底。凡心眼實在，表裏如一，坦直慷慨，言必信，行必果這一類人到處都歡迎底。蓋人與人心氣相接通，彼此能共事者在此。所以在我們此時，縱然文化雜亂無章，未臻協調，難有

標準，而人人有信用，則猶有其可憑之點在，亦足以相維繫。

更且是從這裏亦不難產生新文化。今天我們新文化之難於產出，非在受到什麼阻抗。恰相反，就苦在遇不着阻抗。你說「民主」，他亦說「民主」，人人都在說「民主」。你說「自由」，他亦說「自由」，人人都在說「自由」。弄得「民主」「自由」遍於天下，充耳塞目，不勝其煩，而民主自由乃愈不可得。你如果從名詞上口號上求之，則各樣不同文化在中國早已達於協調了，用不着再去創造。然而事實何在呢！所以只有羣以無信用為賤，相約不理睬他，使他不能存在；一切澄清下來，然後中國才有辦法。

三

樹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是第二。人們彼此間有信用，遇事自能合作；然為挽救大局，開展前途，更須加意求之。

國共兩大黨今天相殺相斫，不惜毀滅國家，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然而他們本是相爭之兩造，宿怨積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豈易合作。在他們以外，廣大之第三方面不能合作起來，成為一大力量，以轉移形勢，奠安大局，才是真該受責備者。而況且在第三方面原有聯合底；不唯不能擴大充實這一聯合，乃其後竟又合不攏，而一箇一箇裂出去。這才真是不能合作之最大者！陷大局於今天不可收拾地步者，實乃在此。在大局政治而外，其餘不論大事小事，如我們所見，都為其間彼此不能合作，許多聰明，許多力氣相抵相消，而墮陷於僵局，寔尋於毀敗。隨處都是例證，不煩枚舉。則力求合作，豈非救時之藥。

再則展望新社會，我相信前途，在政治上決不是各黨各派各自活動，合法競爭，如英美方式，而是彼此合作；在經濟上亦決不是企業家互不相謀，自由主義之時代，而是生產者消費者都彼此合作。說世界潮流今後要日進於民主，亦正因今後一切的是要彼此合作之故。則力求合作，恰是進行新建設了。

因此，一切有心人應當在有形無形之間，隨時隨地，倡導合作運動，培植合作基礎，散播合作種子，消除人與人間的險阻隔閡，使此渙散而且僵痺底社會融合復活起來。然而要同人合作，却亦不是一容易事。我素常講人與人合作的基礎條件有二：

一、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

二、在識見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時下風氣刻薄，專好以不肖之心推度旁人。談論之間，總是說人壞話，不說人好話。一般人相與之間，除表面有些虛情客套外，其內心絕少對人存恭敬信服之意。自共產黨理論之輸入，動輒以「統治階級」「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指目於人，非懷敵意即存鄙視。而人亦以洪水猛獸視共產黨，隔閡誤會至不可解。這樣就失去彼此合作的基礎，直是讓社會走上絕路。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放得坦白空洞，虛心以求瞭解一切。而在與人合作之初，尤須拿出信心與熱情來。偶有誤會隔閡，總力圖打開，重新求取瞭解。如此路子愈走愈活，才可開出光明前途。人情大抵不相遠，而彼此感應之間，至神至速。順轉逆轉，出入甚大。關鍵在我，不必責之於人。

對於一件事物，而兩箇人所見不同，主張各異，除了各有其立場和用意外，便是彼此的識見問題了。構成一個人之識見底，一則在他的頭腦聰明，二則在他的學識經驗，三則在他對此一事之見聞所得。這些地方，無論賢愚每每不肯讓人。誰都覺得自己聰明，誰都相信自己的判斷，誰都自以為是而不肯服人。彼此不能合作，亦多由於此。其實聰明關乎箇性，經驗限於一隅。與其各執一偏，不如善觀其通。任何不對底見解，亦都是真理的一面影子。彼此所見不一致，未嘗不可相資為用，正不必抹殺人家。平素我總感自家學識不足，臨事日恐思慮有所未周，或者他知底底有在我所知之外者，願更資取於他，成就自己。往往這樣，倒引起對方亦來接受我的意見。由相遠而相近，由不合而漸合；合作基礎遂以建立。

舉箇例來說，我與共產黨之間雖然有很大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這距離不同尋常，不易泯沒。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底。我有心肝，他們亦有心肝。我對於民族前途，對於整箇人類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遠大理想；除掉這遠大理想，便沒有我。而他們恰是一箇以遠大理想為性命底集團。說到眼前一樁一樁事，尤其容易說得通。這樣，遇着該當合作底事，就可以合作。語其合作之所以可能，要不外有合於上面兩條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非薄人家；相反底，我敬愛這些漢子。至於見解主張之不同，不妨「寬以居之」，一切從頭商量。異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實所必要上，讓一步又何妨。歸總一句話：把人當人待，那裏有說不通底話。自外於人，偏說人拒我，那就不行了。去年三月我第二度到延安，在他們歡迎會上，我就會這樣坦白自陳，並提出這合作的兩基礎條件來，供他們參考。今又特提出請教於各方朋友，請教於中國人。我以為只有這樣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底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傅孟真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滋泥」，這句俗話正是今天中國的現狀。「滋泥」是勞苦大眾，蝦米是公教人員，小魚是小生意人，大魚便是大資本家。

但，大魚也分好多類，有三尺長的大魚，不堪鯨魚一擊，有鯨魚，不堪鯨魚一擊。今天長鯨有兩個，皆憑借政治成就；在生長中的還有幾個，要看後來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鯨魚腹中之勢。

「官僚資本」一個名詞是抗戰時候的產物，還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當時的中心對象是孔祥熙，現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決不當忘了孔祥熙。現在我解釋這名詞一下。

現在必須分辨三件東西：第一，國家資本；國家資本的發達是走上計劃經濟、民生主義、溫性的社會主義必由之路，所以如果辦得好，我是百分的贊成。這些年國家資本相當發達，但內容和表面大不相同。從表面說，鐵路除中長為俄有外，幾全是國有（除去宋家與洋人要修的成渝鐵路等）；航業則招商局，壓倒一切民航；航空號稱民營，實是國家資本；主要的銀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英國現在工黨所行的社會主義政綱，好多我們已經實行了，例如鐵路，銀行，主要工業之國有，我們都作了，然而結果不特愈弄得去社會主義愈遠，而且去任何有效政體，像樣社也會愈遠，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國家資本之基礎觀念上。

第二，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在中國真發達極了，上自權門，下至稍稍

得意稍能經營的公務員，為數實在不少，這幾乎包括中國的資本階級及上等布爾喬亞。西洋的布爾喬亞總是投資在股票或債券上，中國工業不發達，已有者又破產，誰玩股票？債券是靠國家信用的，今天還說得上嗎？中國過去官僚總是投資在田地，今天田地是個大累贅，誰肯？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第三，權門資本。權門資本本是官僚資本之一類，然而其大無比，便應該分別看了。這些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他的官僚資本。為所欲為，愈受愈大。用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為了解所謂 *Sound Business* 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搶斃了的），家奴……其效能與注重工業遠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過之。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會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真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難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利則歸己，害則歸國者，例如某某幾個私家銀行，在戰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維持，兩三年前他准許這幾家銀行退還官股，以當時一元當戰前一元！所有這些銀行在收到官股後所獲的利益都不算了，這簡直是拿國家的利益直接的、毫無掩蓋的送人；其實並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為其中某某幾個銀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機不密，為若干參政員所知，於是參政會大鬧幾陣，「此說作

「罷」，但真正罷了未罷，以後誰來查過至於「扒手之說，決不寬他，即如中央銀行國庫局案，人證物證俱全，雖說政治上使其擱着，因為已經「退還」（試問小偷強盜退還贓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並未完結，因為原告並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為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言歸正傳，我們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這與經濟無關之人。辦這樣事，那有不嚴密的呢，然而八年參政會已經鬧出那些事實來，鐵幕也有漏縫之處，然而漏縫之處究竟所窺有限了。其實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無所見，請看揚子公司，進口那樣好，他結外匯何以那麼容易呢？資產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錢嗎？若說「久宜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槍斃的故海軍上校劉乃沂答辯的理由），我看，這些年來久宜，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滿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辦法。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戰前也曾吸收過若干社會上認為可以有為之人。上海的「高等華人」戰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國民黨整天談「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國營」，……宋子文做了國民黨的沙赫特，儘管他相信他的 Sound business，也應該稍許有個樣兒，然而完全與這些口號相反的。

不談國有國營則已，要談則第一件要國有國營的便是公用事業 Public utilities，偏偏我們要「宋營」。現在全國電氣事業，除冀北由資源委員會接收外，其餘均非國營，而且走上了集中壟斷的路。如成豐電（壟斷京滬之間），首都電廠，以及武漢之既濟水電公司等，均為建設銀公司所有之揚子電氣公司經營。人人皆知建設銀公司姓甚麼。

煤礦在原則上亦應由國家經營，因為他是動力的來源。中國煤礦除勝利後在東北及熱河接收者外，皆非國營，北方的多為北洋軍閥官僚所營，本是國民黨北伐時打倒的呼聲之一。現在揚子江東區之唯一大煤礦，即淮南煤礦，也是建設銀公司所營。最近江西之鄱陽煤礦，又為建銀所買到。四川某煤礦，又以另法支配。現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經定了，北洋軍閥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誰買，是可想的。

說到這些事，煤礦，電廠，本由張靜江先生之建設委員會而來，當時是國營，因為建設委員會是等於政府一部的。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說到建銀，由一個美國人來華造計，原為吸收外資的，尤其是美資的，美資並未吸收着，定了一個不利的成渝鐵路借款。本來是官股，許私人入股。現在我不知道還有幾分官？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以上的這些，政府若對得起人民，該去清算的。

難道宋子文不談國營嗎？他是談的，現在有他的資源委員會。辦資委會的人，確也認真辦事，絕不能說貪污，然而賺錢的事業既已「另有辦法」，看看他的事業單子罷！東北工業，在那樣情勢中！撫順毀壞，北票不安。銅，鐵，電氣材料，機器，無一不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所以這些國營，這是「國賠」而已。資源委員會也得設法自食其力，於是經營到台灣糖（專利），自行車，肥皂，蠟燭，……資源二字定義如此！

宋也「為國家」營了一件「賺錢」的事，就是中紡公司。那些反對他這事的，本也多是要直接接（「抗戰工業或非工業家」）又請流動金的，並不可取，然而他營的成績如何？號稱去年一月一百億歸政府，今年一月三百億，算是賺錢了罷？然而想想，一百五十萬紗錠，全無代價，一切生財，是接收的，美棉用官價結，數目那樣大，消耗外匯那樣多，如是報效政府僅僅此數，真是得不償失，這叫賺錢嗎？說是平抑紗價嗎？又不然，紗布價在生活必需品指數上為先鋒。他又說了，中紡只佔百分四十，商家漲了，他無法控制，這真左右前後均不能自完其說了。年底分紅那麼大，是有益於國？假如當年把這一百五十萬錠賣了，不自送人，法幣回攏，要比黃金政策得多，紗價還不是一樣高，反正他自己說他不能控制。還有一妙，因為「人民」為此事吵死，他又說，將來發股票賣給人。假如分開賣，有人買的。現在合成一個托辣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誰來買他，買就是捐款給他，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談麼？

這樣說下去，多着呢，今天止於此。現在說結論。
豪門資本這樣發達，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這樣子，太慘了（雖說是日軍閥作禍首，然財閥如不發達，軍閥無能為力）。

他們還是幾代（從江戶時）辛苦建立的，不像我們的這樣「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歡迎孔宋當國者，只有一派人，即共產黨和他的尾巴，因為二氏最可使中國紊亂的。我們不願我們的國家成五胡十六國，成外蒙古，我們實在不能歡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垮，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他的自由買賣，澈底失敗了。頂好的說，你總不能用甲思想作反甲思想的事，何況他的思想是由於他的 vested interest？

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為他聽到公園裏蛤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們必須清算十年的事物，那些是公而私的，那些是私而公的。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現在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我們的又是一個混亂沒進步的國家。我們要是老這沒進步沒出息，世界的繼續動盪固然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沉淪到萬劫不復，即使世界安定起來，我們還是走頭無路。那時，我們好比一個村塾頑童，人人將成了我們的敵師；好比一個市井無賴，衆鄰均所不齒。所以進步——而且是最大可能的最速可能的進步——是我們最急切最重要的要求。在有秩序的世界中，進步的中國可以很快的達到富強康樂；即使世界繼續紛亂，這個中國至少還可以飄浮而不至於沉淪。

然而，在現實的情況之下，進步豈是一件容易工作？我們本來就是窮，戰爭使得我們更窮。我們本來就沒有建立過法治，黨治人治使得我們離法治更遠。我們本來就很少自由的科學的思想，愚妄的（不基於知識的）和自私的（不為大眾利益着想的）宣傳使我們更不認識自由和科學的精神。加以近年來蔓延不已的內戰，和因此內戰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利害衝突，更使我們貧窮，混亂，落伍。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下

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我在參政會如此說過。有些報紙說我說，二家財產够國人過一年美國人生活水準，那是他們說的，說過與不及一樣壞。）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你們曉國家十五年，給一個喘息的機會罷。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有朋友問我，你說孔宋不好，張家璈何如？我說，何止張家璈，連那些「自由計劃經濟家」，無知低能的「民主主義哲學家」，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對於過去的萬忍不住，對於將來，我並是「政治經濟病蘭學」專家。

這篇文章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編者按：已見本刊本期「觀察文摘」一欄）

要求進步，其實現必然千難而萬難。不但實現進步是難事，連什麼是進步也好像成了問題似的。不但把握實際權力的人所說的進步不見得是真正的進步，即使為外國人所譽為進步份子所說的進步也不見得是真正的進步。正因為實現進步的不容易，所以有一羣有資格的人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乃更有其重要。必定要大眾認識什麼是進步，人們才會要求進步，而他們所要求的也才可不為他種東西所魚目混珠。

進步不能單單是抽象的觀念，也不是幾件具體的改善之謂。假如說，近代前進思潮傾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我們並不能因嚷嚷「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即算進步。再假如說，報紙發行普遍為近代進步的一種表現，我們也不能增加了幾十種幾百種報紙，即可自以為有了進步。進步須是一種整個的看法，具體的表現須和抽象的理想符合，而所謂具體的表現者又須是一切表現的總和。

須能超過少數人或是一部分人一時一地的利益，須能顧到大眾（就中

國言則爲中國大眾人民)長期的利益,更須能顧到這一羣大眾在所處時代中的競存能力而思有以保存之並增強之,才能抓到進步的意義。不能認識時代,明瞭整個人類前進的過程與夫中國人民在這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不能談進步。不能對大眾人民發生同情心,發生一種救苦救難的慈悲心,也不能談進步。空空洞洞嚮往進步,而對於阻礙進步的人們或噤若寒蟬不敢置一辭,或陽反陰附爲虎作倀,更不能談進步。

再說得切實一點,進步者無論對於文化,對於種族,對於經濟制度,對於政治關係,或者對於文藝生活,均得有一種前進看法,而這看法的基本要點即是承認人的尊嚴,生的重要,以及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

承認了人的尊嚴,則人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必須認爲是天經地義。個人的自由必須尊重。人必定認爲是理性的動物。因之,一切否認平等自由的思想制度均是改革的對象。不如此便不是進步。

承認了生存的重要,則一切妨害生存,限制生存,給生存帶來了痛苦的因索均在掃除之列。小而言之,迷信是要不得的。大而言之,戰爭是要不得的。因爲迷信與戰爭都是生存的敵人。從方法言,科學技術是需要的,從實施言,社會主義的經濟也是需要的,因爲兩者都可以增加生產,增加人的享受。

承認了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則宗教集團間的傾軋,階級間的鬥爭,民族間的對峙,以及某一羣人或某一民族的優越感都成了反進步的表現,必須予以擠斥。

再舉幾個例:擁護統治階級,而不問統治階級的行為是否合乎被統治大眾的利益,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否認了人的平等,人的尊嚴。贊成內戰而不問內戰之如何消耗民命民力,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蔑視了人的生存權利。提倡國粹,而不問國粹之如何不能通行不能適時,也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抹殺了人類的整個性及進步性。

那種人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呢?政客們以政治爲生活,應該知道中國之急須需進步。然而中國近百年來,沒有一個時期的政治曾經和時代配合過。道咸時代的政治和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與生產制度不配合,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和首次大戰的政治經濟主義不配合,今日的政治和原予能與社會主義更不配合。加以政客們在高度的個人集權主義之下早已成

了少言語更少思想的機體。希望他們從不進步中掙扎出來顯然不易。生產家怎樣?從事生產業者,無論農夫、工人、企業家,歷年來都是遭逢着極端不利的境遇,他們不特不能改良生活或是擴充事業,就連溫飽的維持都成了問題。但農人工人大都未受教育,且習於定數之論,絕少自求超脫意念。企業家則爲既得利益所困,投鼠忌器,更難有所發揮。祇有教師們,知識高於農工,時代的趨勢以及中國所遭遇的危機也該明瞭,又沒擁有像企業家們所擁有的既得利益,說說話應該可以沒有危險。這樣說來,教師們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並提倡進步了。

然而教師們畢竟能不能呢?第一要問,他們的傳統是否依舊是過去士大夫的傳統?他們是否也擁有着士大夫們自以爲擁有着的既得利益?對於中國過去士大夫階級作公平的評價本不十分容易。可得而言者,士大夫階級所滋長的社會一貫的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社會。這少數人或許是閱閱世家,或許是將帥大吏,或許是皇族國戚;在某一個時代的,這少數人定必是現時所謂統治階級。士大夫階級最奢的慾望是和某一時代的統治階級打成一片,最起碼的企圖則求爲這統治階級所垂青,所引用。因此,士大夫階級縱可以轉移社會的習尚風氣,而絕少有左右社會的力量。中國歷史上最標準的,最爲士大夫所稱道而師法的人物,如董仲舒,如魏徵,如范仲淹,如王守仁,如曾國藩,那一個不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士大夫?然而他們究有多少左右社會,促使社會進步的力量?他們畢生充滿了依附一種現成力量的意味。他們都是衛道者,他們很少能超越他們的階層利益,而爲廣大人民的利益設想。爲廣大的民衆設想便須變制,而變制即不是衛道。我們如果將士大夫領袖曾國藩和沒有士大夫階級的英國格拉斯東(和曾同時)比較,而研究何以好像開明的曾大學士對於法制經濟那麼沒有建樹,何以生性保守的英首相對於選權、宗教、財政等事倒有大作爲大變動,我們或者可以窺見進步和士大夫傳統之兩不相容罷!

今日的教師們又怎樣呢?無庸諱言,他們是分的歧。一部分,無論是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牢守了過去士大夫的傳統,絕對不想跳出那傳統。又一部分則接受了近代的社會思想,放棄了依附統治勢力的傳統心理,決心爲全社會的利益努力。另有一部分人則徬徨歧路,不知如何自處。人人有惰性,比較簡單的自處方法似乎應照傳統而行。但人人也有理性,

比較滿足良心的自處方法又似乎應作一番檢討，一番自新。他們於是徬徨無定，甚而至於煩悶。在今日的教師們中，第一第二部分人或許俱是少數。第一部分人或者只限於少數『成功』或自以為『成功』的人們。因為『成功』了，所以也有了『既得利益』的觀念。第二部分人則只限於少數最明白最熱心最富於同情（同情大眾福利）的人們。徬徨歧路者或許佔了多數。教師們能各成爲進步的力量，就要看這一個多數能否毅然脫離了士大夫的傳統，把他們自己看做了一切社會利益的釀造者，而不是統治羣的支持者，點綴者，最後乃是參與者。

有若干因素說明這一羣衆多的教師，是不易終止徬徨而負起倡導進步的大任的。但有若干因素則在指示着，他們必可負起這個大任的。士大夫傳統力量的深固，以及若干人繼續不斷地讚美這傳統，可以使教師們不能從懷憶中覺醒。還有，政治鬥爭的尖銳化，不朱則朱必詆爲墨，不墨則墨必詆爲朱；朱容許是極糟，墨亦未必是百分之百的進步，這種夾攻也可使本性溫和的教師們趑趄不前。這兩者都是不利的因素。

但在另一方面，中國長期的不進步，近今高度的混亂，與夫人心極度的厭亂，都在急切地要求進步，要求不流血或極少流血的進步。絕大部分教師們因自己的窮困，和他們從戰爭中體驗出來的人民普遍窮困，以及他們的學生們之逐漸變更階級意識，學生們之減少以未來統治集團自視，學

生們之增加以大衆人民之發言人自視：這些也在逼迫。師們和士大夫的傳統訣別。還有，世界在大變動中。十年以前世界是法西斯主義強抓住了全世界人民的喉頭，全世界人民幾乎要窒息死去。但是會幾何時，納粹之德和法西斯之義兩俱滅亡。在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中，大多數人民不是奴隸，便是被宰割着被統治着。最前進的政治經濟只是目下英美人所一致認爲落伍的貴族政治和放任經濟。到如今，則大衆的知識，生活的水準，和人的自尊心已有了百年前所不可思議的提高。這樣的變遷所發生的力量，必不能容許我們故步自封。我們順着潮流走，則進步快而心境愉快。我們逆着潮流走，或是擋着潮流不走，進步也終會降臨；不過，進步就要遲慢，犧牲就要重大，而身處其境者亦必十分痛苦。這三者都是有利的因素。

我們當然十二分希望這大多數的教師能終止他們的徬徨，能爲中國人民的推而至於爲全人類的進步而努力。如果他們不拿起進步的旗幟，目前國內將更無另一羣人能負起這重担。這樣，如上面所說，進步不但將延遲，而且必爲世界所逼迫出來的結果，也必將從大流血大犧牲中得來。多少年代之後，頭腦冷靜的史家們一定要詛咒我們這一代教師們之沒有出息！反過來，如果教師這一羣人能提倡進步，歌頌進步，代表進步，進步的力量一定可以很快地壓倒不進步假進步和反進步的力量。儘管教師們仍是以教師爲職業，不參加實際的政治服務或是社會服務，反的力量試問將有何法以維持其自信力？將有何法以取得理論上的支持？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簡貫三

一金潮的過程

這次的金潮風潮，是由黃金美鈔的暴漲引起來的。據報端所載，京滬一帶，一月三十一日，黃金每兩售價四十三萬二千元，美鈔每元七千五百元，自二月一日起，黃金上漲爲四十四萬五千元，美鈔爲七千七百元。這

個漲勢，一直扶搖直上，至二月十一日，達到了最高峯，即黃金八十六萬元，美鈔一萬六千五百元。甚至於有黃金漲到九十六萬，美鈔漲到一萬八千元之傳說。從十二日起，這個漲勢，忽然退潮，黃金下落爲七十萬元，美鈔爲一萬一千五百元。十三日雖又有回漲，但退潮之勢已成，實難有再鼓餘勇的魄力。所以從十五日起，金鈔價格呈現暫時靜止的動態。

二 金潮的影響

風潮的時間，不過是十二天，而其影響，確是我國勝利以後從最嚴重的事件。這些嚴重的影響，首先是一般人民生活的降低。因為黃金漲了一倍，美鈔漲了一倍半，其他物價，急流勇進，不甘落後，竟漲了兩倍三倍之多。有些富裕人家，利用投機掠取的慣技，在十二天之內，賺了黃金壘，美鈔滿袋，而我們中層以下的人們，一覺醒來，十萬元法幣忽然不翼而飛，貶成了七萬，再過了十天八天，生活水準又降低了一倍還多。上海大公報所載十五日廣州專電，「中山大學五千員生亦受此次金融浪潮之震撼，該校所在地碎石，各米店會一度停售，飯店客飯價錢，十一日一天之內，由一千一百元漲到二千四百元，遂致一部份學生改食紅薯。」以此類推，公教軍警人員每月有三十萬元薪水的，經過十三天的變化，忽然降低為十二三萬元，最多只有十五萬元。此外，各城市中產以下的人家，莫不受金潮之連累，把生活水準很迅速的降低下去。現在金價雖回落四十八萬元一兩，但一般物價還未照此比率完全下降，所以它對於一般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依然繼續存在，並不因政府公佈的經濟緊急方案以後，而能將生活水準恢復到一月三十一日的標準。

這是此次金潮的基本影響。由於基本的影響，引起了各方面的焦急惶惑。蔣主席于十一日聽到黃金漲到八十六萬元一兩的報告以後，赫然震怒，下令嚴辦。宋院長貝總裁迭次由滬來京請示，不敢再自行決斷。中央常會臨時組織經濟政策委員會，便由此而來。宋院長素以自任自負聞于世，尤其是對於金融經濟問題，更自以為勝算在握，而今竟在經濟政策委員會中與各委員連日研討應付方案，亦可見金潮來勢之凶惡以及經濟情勢之危殆。立法院于十四日舉行大會時，各委員為着金潮泛濫，妨礙國計民生，一致要求宋院長列席下次院會，以便質詢，宋氏允于兩週內來立法院與從未見面的委員們會晤一堂。

金潮震動了首都，並改變了宋院長對人對事的態度，這是金潮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

當金潮發展到 *Chinak* 的時候，聯合社華盛頓十一日電：「國務院發言人宣稱，中國法幣價值跌落，經濟危機日深，美政府日漸關切……據非

正式表示，今日之事，乃中國自身問題，應由中國負責應付。已往中國迭次告急之時，外間即謠傳美國擬採取緊急辦法，協助解救，但官方並未予以證實。此間又傳南京政府擬將中國私人在美存款，收歸國有，但亦無法證實。」以我的淺見觀察之，這個電訊，包含三個意義：一，表示外交式的一種關切態度。二，表示不要存求救的希望。具體言之，即暫時談不到什麼貸款問題。三，暗示中國私人在美存款，中國政府或可動用，以資自助。此訊發表，過了五天，國防會議于十六日通過一個要案：由政府定期照法定匯率收買國人在國外之存款。以前後的線索尋繹之，金潮激動了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暗示了中國政府，于是才有收買國外存款之動機與決議。這是金潮影響國外，又由國外影響國內的地方。

三 金潮的因素

此次金潮，其來也暴風驟雨，其去也如江河日下，似乎令人有飄忽之感。但一究其來龍去脈，實在有其相當的遠因與近因。

第一，從政治方面說。此次金潮的背後，潛伏着嚴重的政治問題。如行政機構的層床架屋，互相牽制推諉，誰也不肯負責，誰也負不了責，流弊所及，所謂萬能的政府，變為無能力的政府。如此機構，如此效率，投機掠取的份子，自然同隙而動，再接再厲。又抗戰時期，政府對於這般人始終未予以有效的制裁，恐不畏法，相習成風，此次金潮，不過是九年以來連台表演的一幕。只因爲演的人過於起勁，看的人認爲過火，才引起朝野的譁議。

第二，從政策方面說。本來金融政策應該是配合財政政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配合經濟政策的。倫敦 *Times* 報常以「金融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奴隸，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奴隸」，「用勉行政當局，以指示國計民生之關係。然而我國的行政當局竟以金融政策領導一切，以營利主義爲最大目標，于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這般投機掠取份子自然無所顧忌，越幹越胆大了。所以這次的金融狂潮，骨子裏隱伏着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問題。

第三，從法幣的膨脹方面說。法幣的膨脹與流通速度的增加，勢必使物價由算術級數跳到幾何級數。在七七抗戰之時，法幣發行額計十四億七百萬，至三十四年底，膨脹到七百三十五倍——即在八年中，平均每年

膨脹九十二倍。至三十五年底，大概膨脹到三千三百五十倍——即在去年一年之內膨脹了二千五百一十五倍，比過去八年中的每一個年頭，平均多二十七倍。這是一個大概的估計，究竟是否正確，我不敢確定。茲再退一步想，假定法幣的發行額為三千倍，法幣的流通速率為四倍或五倍，則法幣的貶值程度與物價的上漲倍數，恰好如現在一萬二千倍以上的數目。但是今後法幣的發行率，若不加控制或緊縮，那幾何似的物價上漲，必定越翻越大，越大越快，終有超過法幣脫離法幣之一日。

這種道理，一般人雖習焉而不察，但是看到鈔票的金額越印越大，物價越過越漲，當然感覺到法幣幣值日在低落之中。客觀的事實是如此，主觀的心理也是如此，這就是大家爭購黃金美鈔的有力因素。所以在法幣未加以整理以前，似難禁止黃金美鈔的上漲，尤難根絕黃金美鈔的黑市。不過禁止買賣以後，希望與物價漸漸脫離關係，以免常常波及一般人民的生活而已。

第四，從少數富貴買辦操縱牟利的方面說。一般公教人員、文化工作人員、小商人，以及勞工農民，平日生活，均感十分困難，那還有餘資購置黃金美鈔呢？就令少數人以節儉之錢，買到星星點點的黃金，也不至於操縱市場。可見這次大批買進而能够操縱市場的人，都是富商買辦之流。

第五，從外匯調整的謠傳方面說。舊曆年前，即有外匯提高的謠言，後來金融當局一再宣佈否認，而商人的敏感性，並未受到多大影響。二月六日進口附加百分之五十，每美元合法幣五〇二五元，出口補貼百分之百，每美元合法幣六七〇〇元，而其他外匯官價，仍為三三五〇元，是以對美外匯，形成了三種匯率。因為匯率的歧異，以及進出口匯率的增加，所以以投機者，操縱者認為與風作浪的機會又來了。

第六，從一部分工業貸款的方面說。聞舊曆年關，國家銀行貸給工業界三百億元。因此，五千元一萬元一張法幣，流通市面。據南京大剛報二月十日上海電，「上海鎮江等地，有一部分廠商，利用舊曆年前借來的大量法幣，購買黃金美鈔。」以後政府對工貨政策應有妥善的考慮，並在方法上要有徹底的改善。

第七，從舊曆年關過去的銀根方面說。舊曆年關為工商業的大關。關前的半個月，銀根必然緊迫。關後的半個月，許多商業多未正式交易，頭

寸必然充足，所以于舊曆正月十一日（即陽曆二月一日）起，即開始掀金鈔的風潮。

四 金潮的應付

由上面七個因素看起來，足見此次金潮之發生，並不是偶然的。既非偶然，而竟釀成狂潮，殊覺事前有失于防範之處。當風潮正在擴大之時，行政與金融當局，亦覺未盡最善之努力。試舉一例。當局若自以為黃金政策仍有維持之必要，即應令中央銀行盡量拋售，否則，不如早日宣佈停售，以免遭最後之失敗。不意二者均未採行，而在時地時停之中，徒增加投機者的勇氣，使其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從政策與實力方面說明當時應付的失當。再從精神與輿論方面，亦可推測有未善于運用的地方。當金鈔正加速上漲的十二天之中，宋院長貝總裁始終一言未發。如此沉默，固然可以表示沉着應戰，使人莫測高深。但是這種態度，只能適用於盡量拋售之時，而不適用於拋拋停停之時。有力用力應付，無力不得不以言語求大家精神上的安定。即令不可以言語表示，亦應運用輿論，抨擊投機冒險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效力。這兩項又未做到，無怪乎金潮幾成橫決之勢。

至于民間方面對於金潮的應付，亦顯然冷淡無方。在民主國家，像這樣的巨變，使一般人的生活驟然惡化，必定惹起輿論的指摘與民衆的制裁。可惜我們的輿論，連好說話的大公報竟無一篇社評論此事，我們的文化界，我們的民意機關，民衆團體對於此次震動中外的金潮竟沒有嚴正的表示，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潛力，無怪乎馬歇爾的臨別贈言，認為「中國民主進步份子未能形成社會中的集體力量，實係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大缺憾。」（述其大意）

說到這裏，我想敘述一個小小的穿插。即當十一日晚間，我和立法院機委員長桐孫，劉委員不同，李委員慶慶等談及金潮之嚴重，認為應建議當局，實行黃金外幣國有，或停止黃金買賣，以期挽救狂瀾。當時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龍選舞先生在座，遂將此訊刊載十二日中央日報重要地位，接着滬上各報及國外通訊社紛紛轉載，于是滬上投機商人忽然有徬徨之感。十二日以後，金鈔價格，由八十六萬落到七十萬，這個消息，似乎有點影響。現在黃金國有之議，一時或許不能成為事實，但此議在金潮漲時所起